



两位俄罗斯汉学家的师生情

谷羽



老师阿理克(左二)与学生休茨基(左三)合影

俄罗斯有位汉学家,译著有《聊斋》《唐诗》以及《中国文学论集》两卷本;郭沫若佩服他学识渊博,尊称他为“阿翰林”,这一称呼得到俄罗斯汉学界同仁的赞赏,这位汉学家就是瓦西里·米哈伊洛维奇·阿列克谢耶夫(1881—1951),汉语名叫阿理克,他也是当今公认的20世纪俄罗斯汉学学派的奠基人。有意思的是,阿理克跟他的得意弟子尤·康·休茨基(1897—1938)相处多年,十分投缘,因此两人称兄道弟,有诗为证:

刮脸腮如缎,目小利似锋。

落拓休兄者,方敢擒葛洪。

这首模仿汉语五言诗的绝句,就是老师阿理克写给弟子休茨基的:第一句调侃休茨基不修边幅,平日邋遢,胡须满面;第二句开玩笑,戏说弟子眼睛细小,却炯炯有神,目光锐利;第三句透露出自己与弟子称兄道弟,足见师生关系之随和亲密;第四句赞许休茨基翻译研究葛洪的《抱朴子》取得成果,老师为弟子感到自豪。

这位休茨基多才多艺,能写诗,能谱曲,还能画画、篆刻,更是个语言天才,掌握了十多门语言;1923年出版的《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》就是由他翻译的一本中国唐诗选集。老师阿理克为这本诗集撰写了序言,提出翻译中国古诗的原则:注重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方法,科学性强调忠实于原作,艺术性侧重兼顾作品的音韵节奏和音乐性。

在老师阿理克的指导下,休茨基经过多年努力,把深奥的中国典籍《易经》翻译成俄语版本。《中国典籍·易经》语文学研究及翻译的经验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,博士生导师阿理克对这位弟子赞赏有加。

阿理克不仅为休茨基写诗,还为他撰写了一篇小传,题为《楚生》。他给弟子起的汉语名字为“楚紫气”,看来师生二人对中国的“楚文化”均有浓厚的兴趣。“休茨基”和“楚紫气”在语音上也有近似之处。阿理克为弟子撰写的小传,通篇模仿蒲松龄的聊斋

笔法。几经推敲,我尝试用汉语翻译如下:

楚生呱呱坠地浑身披毛,若毛发缠绕之肉团……母付诞下怪物。适有和尚路过,见后龇牙道:“汝子将为僧人弟子。”母稍安。

楚生秉性怪异。弱冠之年造一巨弓,弓弦长过两丈,狂拉弓弦,如拉琴弦焉。庭院中犬吠,有乌鸦飞来应和鸣叫。

稍长,楚生无师自通擅写汉字。一次归家,抓起木棍缠布条作笔,挥洒书写:瞬间,天棚、四壁,处处布满笔迹。滴滴答答!灵感之水珠淋漓落地。

楚生善雕刻。从鞋匠处借刀一柄,在无情之木上雕刻……咔咔有声……围观者闻之,怯于近前。惧楚之孔武有力也。一日楚生为仙人雕像。如做三层馅饼,眼馋者,欲品尝却不得,莫名其妙。楚把刀扎向最后一层,左右晃动,忽有目光射出。众皆惊愕不已。

楚生喜读书,博览强记,善诠释。然偶或发狂,口中念念有词,奔跑如风,手舞足蹈,自言自语,如风怒号,听者关注,不

听者如风过耳。楚生反复解释:墨池、钟表、刀剪、绿宝石,皆属阴;而伊萨基教堂、克朗施塔德、亚历山大利亚等建筑,皆为礼。听者惊奇。莫敢斥责,因楚生有证据能自圆其说。

楚生信奉蓝袜教。常目光发狂,着蓝袜,默念咒语。邻有女,其蓝袜丢失日久。一日邻人偶闻楚生房中蓝袜呜呜作响,大惊,遂告官。官差剪破蓝袜,押走楚生,生百般辩解,无用。于是楚生用漆工毛刷于粉墙上作诗曰:“蓝天蓝如碧,深邃默不语。楚生人清白,害他是鬼蜮。”

官闻之大惊:因其亦信奉蓝袜教,路人皆怒目而视。遂放楚生还。

笔者附言:蓝仙、蓝袜、蓝天,皆集于楚生一身!降生身披毛发!见过麒麟者,知楚生出世之奥秘。

汝等幸存者!闻之毛骨悚然!

从这篇小传足可看出,作为老师的瓦西里·阿列克谢耶夫,跟他弟子休茨基关系十分密切,令人称赞。

休茨基感恩老师的栽培,曾为老师雕刻了一枚藏书票,阿理克珍藏使用了多年。这枚藏书票下边有两个俄文词语,意思是“阿列克谢耶夫收藏”。中间刻一个学生像,背着行囊,用木棍挑着一摞书,似乎沿山路向上攀登,有个小精灵似的娃娃在他指引道路。揣测其含意为:学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上面三个汉字从右往左读:不愠斋,出自《论语·学而》首段首句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一枚小小的藏书票,足见弟子对师长怀有的无限敬意与深情。

时光悠悠,如今,这枚藏书票已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。我有好几本俄文书加盖了这枚藏书票印章,分别是阿理克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、汉学家孟列夫和李福清院士赠送给我的图书。其中有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蒲松龄《聊斋小说选》《中国古代散文精粹(两卷)》《司空图“诗品”翻译与研究》,还有阿列克谢耶夫与休茨基合作编写的《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》。这几本书都是我藏书中的精品。

阿列克谢耶夫1951年去世,至今已74年;休茨基1938年去世,至今已87年。两位俄罗斯汉学家的著作仍世代流传,再一次说明:书比人寿命更长久。学者的著作是他们生命的延续。这样的学者令人敬重,让人怀念。



休茨基为阿理克雕刻的藏书票



美鱼图(中国画)赵士英

满庭芳

第五三四期

印中岁月 纽上乾坤

马宇彤



天津、上海等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学者李永东在《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》一书中提出观点,认为小洋楼文化是一种具有“商业性、现代化、都市化、市民化”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,是与中国传统文化、海派文化、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,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”。

小洋楼文化对近现代天津城市空间影响颇为明显。美国记者约翰·赫西(John Hersey 1914—1993),在天津出生、长大,多年后他回忆道:“我长大的地方是一个多么怪异的城市啊,只需要三四个中国铜板,我就能乘黄包车,从我国家的到达意大利、德国、日本或比利时。我去法国上小提琴课;跨过河就能到俄国。我经常去俄国,因为那儿有一座带湖的美丽的森林公园。”这些体现不同国家文化的小洋楼建筑,在天津这块土地上构成了相对统一的城市空间,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小洋楼文化。

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(六)

小洋楼:天津文化精神的时空记忆

李进超

小洋楼是展示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,客观上促进了天津近代文明的发展,对天津近代文化形成也产生影响。天津学者谭汝为认为,“西方文化思潮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;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、中西交流之中,二者又有交融。在近代中国北方,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,得领世界风气之先。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,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,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。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

识、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、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,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”。以作为“他者”的西方文化为鉴,天津城市文化更加彰显了自身特点,在传统文化品格的基础上,进一步塑造出进步开放、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。

城市精神是在历史漫长的时间轴线上逐渐形成的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,天津出现了九国租界,以英、法、德、美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,在与天津本土文化交锋中,产生激烈的碰撞与深广的融合。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参与下,天津在很多方面都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天津城市空间更加丰富,小洋楼及其附近街区以各种空间形式存留下来,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……经历了时间洗礼的新旧城市空间,也彰显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和精神脉络。



刘大枫

德业长昭忆剑国

2025年5月19日北京时间近午时分,客居新西兰的我收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铁荣教授发来的微信:“李剑国先生一个多小时前辞世,倒在研究室的地上。”突如其来,慌不择句,我当即回复:“惊天霹雳,哭剑国……”

这几年,陆续得知一些师友远行的消息,心中的悲戚、怅惘可想而知。但剑国的猝逝,却让我心理上更受震动和冲击。因为太突然了,我一直认为他身体还算好,难以相信这是真的;因为我们太熟悉了,难以相信他竟然会先行。

1979年秋,剑国与我等九人,一起入学南开大学中文系,攻读硕士学位。连同早半年入学的1978级研究生陈洪等七位同学,三年左右的时间,我们同吃职工食堂,同住十宿舍,几乎天天生活在一起。剑国与我所住的不是一个房间,但都在走廊尽头,又门对门,几近同室。我们专业不同,但曾一起在系办和系主任郝世峰先生家,拜见国外的许多著名学者;一起坐在主楼教室里,听外文系老师讲日语课;一起大早晨站在校内小花园里,为等候上课或参加其他活动各自咬大饼。他从沈阳考到南开,本身是山西人,他说过的话我印象极深的一句是“最好吃的菜就是土豆”。

1982年夏,1979级的剑国及我等四人毕业留本系任教,连同稍早留系的1978级陈洪等两位同学,我们又成了同事,亲密关系毋庸赘言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,剑国与我所住的学校西南村家属楼,仅步行两分钟的距离,于是有段时间,他三天两头傍晚时分到我的住处,吸烟、喝茶,山南海北聊大天。剑国曾眉飞色舞地对我讲,《魂斗罗》游戏太好玩了。果不其然,一次我大清早到他家,他开门时手里竟拿着游戏机手柄,让我不禁笑出声来。我俩还曾不止一次地一起骑自行车到天津商学院(即今天津商业大学),在那里任教的研究生同学打麻将,每次都是剑国撺掇,瘾头不逊打游戏。点点滴滴,细故毛举,深情厚谊,永难忘怀。

玩归玩,剑国可是地道地道的学者。从年龄上看,剑国仅长我半年,但论做学问,我却难以望其项背。他在读研期间便有著作《诗苑漫步》出版;之后,更出版了《唐前志怪小说史》《唐前志怪小说辑释》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事录》《宋代志怪传奇叙事录》《唐五代传奇集》《宋代传奇集》等近二十种著作,在古代小说研究、古籍辑校、文化史研究诸方面著作等身,影响深远,并多次荣获全国高校及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各种奖项,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委评为“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生”。哪怕写小文章,剑国的文字功力也常令人叹服,在相关领域和南开中文系可谓有口皆碑。成就必然浸透着心血。剑国曾因视网膜眼病,视力欠佳,但他做学问仍然是青灯黄卷,琢肾雕肝。人们经常见到的是,剑国从新开湖对面的老图书馆出来,提着沉重的一大包书的身影,由此可以想见他背后付出的努力。最令人感动的是,他曾批评我在业务上仅凭兴致,用心不专:“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,哪行?”挚友诤言,极为难得,使我感愧交并,会记一辈子。

我2014年回国,曾与陈洪、乔以钢、李剑国、陶慕宁、张铁荣、王立新、沈立



岩诸位教授聚会。2018年再回国,则惜乎未遇剑国,他这个山西人,据闻去内蒙古办事;而蒙古族的北京老人陶慕宁,又去了山西。此事凑巧,有点戏剧性,但也意味着白云苍狗,步入老迈之年,厮守已非易事。于今瞬隔万里,我想剑国年逾八秩,桑榆暮景,该放松一下了,玩玩游戏,打打麻将,孰料他竟还在为做学问而孜孜矻矻。剑国除了患有眼疾,还有一次生病我记得很清楚,他小女儿突然来敲我房门,告“刘叔叔,我爸爸病了”,我隨即急往看望。在我印象中,他面目清癯,精神矍铄,身体状况大致还不错,孰料天不假年,竟现蓦然离去。我与剑国2014年的那次相聚竟成最后一面。

铁荣在微信中说剑国,“一生热爱学术,最后倒在研究室的地上,也算是一个教师和研究者的最佳选择。好在本人最后没受什么罪”。呜呼!剑国以学术了身命,真是让人既感到如此愧人生,可稍得安慰;也痛惜不已,仰天唏嘘啊!

哲人其萎,德业长昭,含悲属字,追忆剑国。李剑国教授永存。

题图:李剑国教授生前照片及学术代表作

独乐寺密码

金学钧



八架,大阁一所,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”的记载,暗藏了独乐寺的密码:258111,这组数字就像独乐寺观音阁暗层一样,充满了神秘色彩。2是指独乐寺观音阁从外面看是两层,为木结构阁楼式建筑,中间还夹一个暗层;5是指独乐寺观音阁一层自东向西由6根巨大的柱子和横梁所构建,一共有5间;8是指一层内部南北共有8架梁柱,撑起阁内宽广的空间;1是指大阁一座,就是观音阁的整体建筑;11是指内塑像11面观音。独乐寺密码揭示了这座建筑的恢宏和精致,正如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独乐寺所作的评价:“上承唐代遗风,下启宋式营造,实研究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,罕有之宝物也。”

独乐寺密码来自刘成碑,它的去向已经成为一个谜。朱彝尊《日下旧闻考》中对独乐寺刘成碑的记载,引用的是清朝康熙年间智朴所著《盘山志》,但在朱彝尊校订的《盘山志》中并没有发现对刘成碑的记载,可能是他在校订时删去了。但无论如何,至少说明在康熙年间这块碑还立在独乐寺院中。至乾隆年间,在描写蓟州的诗文中已经看不到刘成碑的踪影了,只是乾隆皇帝在他的《寄题独乐寺》一诗中这样一句:“禅心远逐穿云磬,古迹空传没字碑”。这里的没字碑可能就是刘成碑,因为风化严重,字迹已经很模糊了。从此以后的文献中再无提到刘成碑。再者,清朝乾隆、光绪年间都曾维修过独乐寺,而且乾隆年间还在独乐寺东侧建起了行宫,有人怀疑是不是在两次维修的过程中,将已成为无字碑的刘成碑砌进了乾隆行宫,或是砌进了寺后的古井中。独乐寺密码已成千古之谜。(题图摄影:罗丹)

天津的近代建筑融合了中西方建筑艺术,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。其中,小洋楼因在外观设计、功能布局和装饰艺术上融合了西洋韵味和本土风情,从而成为天津建筑文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符号。小洋楼的出现是天津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。当近代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之后,西方文化通过各通商口岸传入中国,地处京畿的天津成为中西方异质文化交汇的落脚点,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俄国、意大利、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在天津设立租界,因而在天津留下了风格各异的小洋楼,小洋楼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,汇入了这座城市内的精神中。

小洋楼文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现象,指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住宅建筑,它们融合了西方的建筑风格和东方的居住习惯,形成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,在

天津、上海等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学者李永东在《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》一书中提出观点,认为小洋楼文化是一种具有“商业性、现代化、都市化、市民化”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,是与中国传统文化、海派文化、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,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”。

小洋楼文化对近现代天津城市空间影响颇为明显。美国记者约翰·赫西(John Hersey 1914—1993),在天津出生、长大,多年后他回忆道:“我长大的地方是一个多么怪异的城市啊,只需要三四个中国铜板,我就能乘黄包车,从我国家的到达意大利、德国、日本或比利时。我去法国上小提琴课;跨过河就能到俄国。我经常去俄国,因为那儿有一座带湖的美丽的森林公园。”这些体现不同国家文化的小洋楼建筑,在天津这块土地上构成了相对统一的城市空间,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小洋楼文化。

天津的近代建筑融合了中西方建筑艺术,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。其中,小洋楼因在外观设计、功能布局和装饰艺术上融合了西洋韵味和本土